理解霍尔

——从媒介功能和新闻真实性的角度看

■ 杨 击

[内容摘要] 霍尔是在英国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的学统之内研究大众传媒的。霍尔把这种理论活动本身看做是一种政治实践,这和我国的党报理论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霍尔对主流传播理论的批判是从其不自觉的政治立场为切入点的。媒介的功能能够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是两个层面问题。对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反映了不同的媒介理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诉求。霍尔视媒介产品为现实(*reality*)的建构而非实现的反映,因而诉诸事实性(*factuality*)的新闻真实性问题是一个伪问题。

[关键词] 意识形态;媒介功能;建构;建构现实;真实性;客观性

我们很难给霍尔找出一个正确的定位,说他是传统学院建制的某某学科某某专业的某某学家,虽然他最后的大学任职是开放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但是他不会被承认为一个标准的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有意识地进行传播研究,并对这个领域的学术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霍尔并不自诩为传播学家。因为无论是对主流范式的美国传播理论还是对他自己侧身其中的批判范式,霍尔都不认为它们是自给自足的、独立的一门学科,他把它们称为"局部的理论"(regional theory)(霍尔,1989,第43页)。

霍尔是从整个社会结构来关照媒介及其传播活动的,尤其是从文化意义的角度考察媒介在社会的结构化过程所扮演的角色。霍尔最重要的观点,首先认为媒介产品并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对什么是现实的定义和建构。第二,媒介产品虽然仍被归入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的范畴,因其不再是某个对象的简单反映。而是对现实的重新建构,所以不再仅仅被经济基础所决定,而是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并且具有一种"物质的力量"(同上)。这样,媒介就可以透过其意识形态的表意作用(signification)参加对文化霸权的争夺。[①]对于霍尔来说,媒介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每一次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都会对社会结构的重塑发生影响。意识形态是霍尔在理论上的落脚点,争夺文化霸权则是霍尔在政治上的策略。[②]

对于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界来说,无论是从事党报理论研究的还是致力于传播学研究的,霍尔都是一个陌生人和闯入者。理解霍尔,需要宽广的学术胸襟和深厚的人文关怀。严格来讲,传统新闻学和主流传播理论与批判范式之间是无法互为解释的,因为它们的前提预设不同,问题设置(problematic)不同,要理解对方,只有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看问题。为了便于理解,我在这里尝试用霍尔的媒介思想来解释我们所熟悉的媒介功能和新闻的真实性命题,并将其与党报理论和主流传播理论对这两个命题的论述作一比较描述。

关于媒介的功能问题

我国的党报理论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确立其传统和地位的。1942年9月2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党与党报》为我们党的媒介(当时的报纸)的功能定下了基调:"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组织者"。这里的集体不是报馆同仁,而是整个党的组织。在党报工作的编辑记者,是党的组织的一部分。"报纸是党的喉舌,是一个巨大集体的喉舌"。我们可以称之为媒介喉舌论或媒介工具论。

王中在1956年写作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中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论及报纸的性质和职能时提出"报纸是传布新闻的工具",但是"报纸,广播,电视传布新闻仅为其任务之一"。王中始终不忘报纸是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但是强调只有通过"办报卖"与"买报看"两方面的结合才能发挥宣传作用,这就是所谓的报纸的宣传和商品的两重性(王中,1999,第37-38页。余家宏和丁淦林,1999,第109页)。我们姑且把它称为媒介功能的折衷论。

主流传播理论的媒介功能观以拉斯威尔1948年提出的框架为基础,即环境监测,社会各部分的联系以及文化遗产的传承。经过不断修正,又增加了娱乐和动员两项功能(麦奎尔,1994,第79页)。这是以自由媒介观为前提的多元功能论。

霍尔则认为媒介是表意(signification)的工具。媒介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现实(reality),制定"形势的定义"(definition of situation),给阅听人提供一个世界的图景。虽然媒介并非直接从权力机构获得指令,或者有意识地对世界进行歪曲的解释去迎合优势定义,但是它们对每个人都同意的东西,即共识的一般边界或框架非常敏感,也只有在这种边界和框架之内它们才能合法地运作下去。所以,"媒介一方面用'共识'来引导自己,同时又以一种建构的方式试着塑造共识,它变成一种"赞同的生产(production of consent)辩证过程的一部分","这使得媒介总是代表着国家中优势的社会利益"(霍尔,1994,第116-117页)。而阅听人对媒介所提供的情景的定义并非照单全收,他们往往根据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来读解媒介所制定的情景定义。霍尔把阅听人的解码分成三种立场:主流霸权的(dominant-hegemonic),协商的(negotiated)和对抗的(oppositional)(霍尔,1999,第59-61页)。从媒介产品到阅听人的读解是一个意义生产的过程,制码和解码之间的冲突就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所以媒介就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

不难看出,党报理论只认可媒介在党的指导下为党的利益服务的功能。王中则是从实际效果的角度考虑,如果报纸卖不出去无从发挥党的宣传作用。传播理论对自由媒介充满乐观,它不但可以提供信息,解释信息,建立共识,传承文化,还可以在战争、竞选或宗教活动中发挥动员作用。霍尔则强调,传播活动一开始就已经有意识形态的前提了,透过媒介的放大和阅听人的消费,这种意识形态就和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接合在一起。从根本上来说,不管你把媒介有意识地当做一种什么工具来使用,不管你旨在发挥媒介的哪一项功能,你从一开始就是有前提假设的,所以一开始就具有意识形态的诉求了。

从表面上来看,霍尔的媒介思想和我国的党报理论在意识形态诉求方面有某种契合之处,但是两者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党报理论中的意识形态诉求是通过一个政党的现实政治力量实现的,是具有强制排他性的,而霍尔所指的是一个传播活动过程完成以后它所产生的不同意义所具有的可能的意识形态诉求,它和权力的接合始终是变动不居的,对世界的优势定义并不总能取得胜利,因此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社会形构的方向是可能发生改变的。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前面3种理论恰好是一致的,它们都建立在主客体两分的二元论的基础上,相信有独立于人之外的自在的外部世界的存在,至少可以把两者分开来考察,其结果不得不是机械的反映论了。

霍尔在认识论上是坚决反对机械的反映论的。在他看来,反映论既是一种决定论,也是一种宿命论。对反映论的信奉还原到政治立场上只能是对现实的屈服和认同。在理论上,他同意阿尔

理论类别	主要观点	标签	认识论	主义或立场
党报理论	宣传、教育、组织工具	喉舌论或工具论	二元,反映论	古典马克思主义
王中思想	传播新闻的工具;因实现其商品属性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宣传作用	折衷论	二元,反映论	实用主义
传播理论	提供信息,反映周遭世界;解释信息,建立共识,实现社会化;传承文化;娱乐;动员	多元功能论	二元,反映论	自由多元主义
霍尔思想	建构实现,制定情景定义,接合权力,形构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	意识形态论	一元,建构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杜塞关于压制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的两分法。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教堂、学校、媒介等组织机构,它们虽然被归入上层建筑的范畴,但是从现实效果来看,它们已经具备了"物质性"(materiality)(张锦华,1994,第105页,143页)意识形态已经不是某种既有社会结构或秩序的后续反映了,它伴随着建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全过程,并在此过程当中始终是有所作为的。从这里我们也能感受到霍尔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策略是互为因果的。

Jay Blumler[3]批评霍尔的观点是"泛意识形态"的(overideological view)。我想这里涉及到"意识形态"概念本身的转换。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有3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它是国家级的宏大叙事;第二,它带有强迫性;第三,它往往是自觉的。霍尔这里所指的意识形态,比如透过学校教育的,透过传播活动的,透过学术活动的,是一种次一级的话语力量,它并非通过强制性来实现其意义的,更多的是通过"自然化",通过"共识",通过不证自明的形态来实现其意义的。作为对Blumler批评的回应,霍尔分析了主流传播理论的意识形态。霍尔认为它们无非是通过"自然化"[4]、"去历史化"和"永恒化"实现其意识形态的——主流传播理论是通过树立其"价值开放"和"价值中立"的形象,用"科学性"的手段掩盖它们和民主政体中的"政治"的共谋(霍尔,1989,第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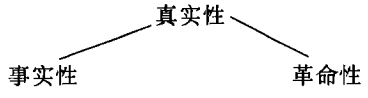
霍尔并不否认主流传播理论在其自身层面上的有效性,但是他反对它们声称自己是价值中立的,因而可以排斥所有与其从不同立场出发的理论与价值观。

如果用霍尔的一元建构论衡量,前3种站在反映论立场上的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议是无效的。只有站在价值层面去判断谁的意识形态诉求更合法才有讨论和比较的可能。霍尔揭示出自由多元主义掩盖其意识形态,并不表明他否定自由多元主义的民主社会;而霍尔思想和我国的党报理论在政治诉求中的契合,并不能成为对任何政治力量服膺的理由。霍尔给我们提供了第三种视角,即哪一种理论都具有意识形态诉求,至于它们的合法性只有从实践中去寻找。无论如何,我们对于现实首先要有一种有效的描述。

关于真实性、客观性和现实诸概念

如果说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给党报理论的喉舌论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性,那么,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又给这种政治手段提供了理论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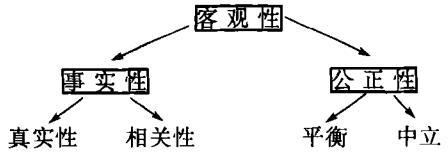
"用事实说明"一开始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在其办报路线中的直接反映。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的发刊词中不断重复的"请看事实"这句话被认为是"中共党报新闻真实思想的源头"(黄旦,1998,第102页)。很显然,即使是宣传,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清楚必须符合传播规律,否则报纸宣传不但会失去功效,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丧失了共产党的威信。陆定一的《我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对党报的新闻真实性原则作了一次全面的理论论述。新闻为什么必须真实,因为新闻来源于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但事实只是新闻真实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所以即便具备了西方新闻理论中的五个W,真实性不会自动到来。那么,新闻如何才能真实呢?"只有把尊重事实和革命立场结合起来","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那么是什么赋予这种革命立场以合法性的呢?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是最进步的生产者的阶级,能够老老实实地理解事物,按其本来面目不加以任何曲解,任何加添或减损(陆定一,1980,第187-188页)。从这两方面来看,党报理论无疑是以其信奉的正确的历史观和正确的策略的统一来为其斗争实践服务的。



有意思的是,西方新闻理论中的客观性原则也是发轫于当时的办报策略,只是它所追求的并非最大的政治宣传效应,而是最大的经济利益。只是到后来,这种客观性诉求才被赋予理想主义色彩的。客观性策略经过百多年的新闻实践,发展出了一个较为成熟和稳定的理论框架,同时成为西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念。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瑞典学者 Westerstahl 在考察瑞典广播制度中的客观性程度所用的客观性标准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在这一模式中,客观性(Objectivity)包含事实性(Factuality)和公正性(Impartiality)两个方面。事实性则由真实性(Truth)和相关性(Relevance)(指选择过程,这种选择是根据预期中的阅听人作出的),而公正性是通过平衡(Balance)各种消息来源和对事件的不同解释所显示出来的中立(Neutrality)而获得的(麦奎尔,1994,第147页)。

比较这个模式中第二层面左边的三角和陆定一的模式。这里的真实性的内涵和陆氏的事实性是一致的,都是指所报道的事件和言论是可以核实的。这里的相关性在陆氏那里是惟一的,即"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至于公正性,既然马克思主义已经证明了革命性是惟一合法的,自然也是公正的,最终就无须诉诸客观性了。

陆氏模式是政治立场和操作性的两结合。客观性模式隐去了它的意识形态前提:自由多元主义社会的政治立场,于是这种特殊的专业主义操作理念被想象成普遍的新闻学真理。党报理论视这种客观性是虚伪的,欺骗人的东西。这种客观性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中需要被批判的"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一种被统治阶级竭力自然化的假意识。但是从实际出发,批判其为"假意识"是无效的,有效的研究应该是揭示它是如何被自然化的,如何成为一种为新闻工作者和广大的阅听人所共同接受的一种理念。

霍尔正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他首先去体认这种意识,然后去揭示潜藏在这种"客观性"专业理念背后的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等重大命题的前提假设。西方主流传播理论所标榜的超历史的立场正是霍尔所要否认的。霍尔并不反对这种专业理念本身,而是反对这种理念的持有者自诩为无价值前提,由此而封杀其它的价值诉求。霍尔的问题设置是这种专业理念的自然化过程是如何完成和达到的。如果从霍尔的角度考察我国的新闻事业,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党报理论在并未完成自然化的前提下一样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或者说党报理论自然化的可能性是怎样的?

霍尔对"客观性"乃至整个主流传播理论的批判正是从认识论着手的,我们可以从他对"现实"(reality)的定义来考察这个问题。霍尔反对主客观两分的机械反映论,因而在他那里区分独立于主体之外的事实(fact)和主体对事实的反映是没有意义的。他更注重我们所能认知的"现实"。这种现实不是静止的,不是独立于主体之外在某处的一件完整的,等待我们去感知的东西(object);而是被媒介和其他机构不断建构的,也是被阅听人从不同的角度不断感知的。媒介如果成功地将其对世界的表征(representation)变为一种公认的对现实的定义,媒介就成功地控制了阅听人,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权力。

在霍尔那里,现实不再被看成只是一组给定事实的组成,它是特定方式建构现实的结果。媒介不只是再生产"现实",它定义了什么是"现实"(霍尔,1994,第84页)。现实是建构的这一概念代替了媒介研究中作为主要问题的"反映"的概念。这种观念与自由多元主义者关于社会秩序的模式是相对的,后者把现实看做是自然浮现出来的,而不是广泛散布于社会中的表征和文化权力所产生的。霍尔挑战现实的"自然性",并进一步指出媒介是维护和履行中心文化的文化权力的主要机制,因为媒介通过对世界、对"现实"、对"自然"的描述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塑造:

> 整个意识形态环境的形塑,运用天生或神圣的必然性,以有限的视角来呈现事物的秩序,使得它们看来像是普遍的、自然的,而且与"现实"本身相符。这个运动——旨在对世界的偏袒的,特殊的解释赢得普遍有效性和合法性,旨在使对"现实"的建构看起来理所当然——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特性和特有手法(1994,第86页)。

霍尔关于"现实"或"真相"(the real)问题的论述和专业主义理念中的客观性命题完全是从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不同的问题设置角度出发的。霍尔想要质疑的是客观性命题的前提假设——自由多元主义的社会模式论。客观性只是在对这种不自觉的假设认可的前提下发展出来的一套操作理念，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已经解决了政治问题的学术问题。党报理论中的"真实性"命题则是在自觉的政治诉求前提之下对党的新闻事业的规定，和霍尔的"现实"命题相比较，它们的理论旨趣都是哲学的，它们的政治指向都是左翼的(虽然立场有古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义之分)，区别在于霍尔将自己置于一种开放的有待修正的哲学之中，而党报理论的哲学指向则是惟一的；霍尔代表了一种非主流政治力量的价值诉求，党报理论则以其现实的新闻事业为依据。

小结

理解霍尔，重要的是要了解，霍尔把他所有的理论活动当作是一种社会参与和政治实践。在霍尔那里，已经不存在我们所熟悉的所谓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了。霍尔的整个工作，虽然采取的是与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完全不同的路径，有着深厚的人文学科背景，但终究是可以理解的。难点在于他对学术本身的态度，接受了这种态度，才有真正理解的可能。霍尔的媒介研究其实是将新闻传播理论置于人文层面来考察的一种尝试，他对学术活动价值中立的批判，也是20世纪人文思潮当中对理性和确定性的质疑在媒介研究中的反映。

事实上，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长期以来的争论也可以还原到哲学命题的争论上来。有迹象表明，有些论者的最终焦点已经落到对黑格尔的"存在是合理"的命题的不同看法上面了。[5]只是在表面上看来还是媒介的功能之争，或者说是媒介功能的合法性之争。这种功能的合法性之争又往往被曲折地表达为新闻的本性之争，新闻学的范畴之争，新闻史研究中的"喉舌"与"耳目"之争。[6]事实或真实性往往被争论诸方拿来作为自身合法的护身符，其中对各自理论合法性的论证(或价值诉求)往往是用媒介功能能够是什么来表达应该是什么的意思。引进霍尔的媒介思想，从一种新的视角来关照，终止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理论愿望，在对现实体认的条件下重新思考我们的理论建设，在实践中应该是更为有效的。

注释：

① 霍尔的现实建构论来自索绪尔的符号的约定俗成理论；媒介不是被简单决定的思想来自阿尔杜塞的"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文化霸权的概念则来自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和文化领导权(cultural leadership)理论。霍尔对这些理论的概念的创造性的接合就构成了霍尔对意识形态这个范畴的特有论述。详见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第5章。

② 这里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不同利益集团的对政治正确性的理解和表达，而不仅仅是主流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身。

③ Jay Blumler，走政治经济学路径的英国批判传播学者

④ 霍尔的"自然化"概念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段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⑤ 详见黄旦博士论文的结束和吕新雨《以人的社会存在为背景的新闻与新闻事业》第5节。

⑥ 详见宁树藩《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对话》，黄旦《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吕新雨《以人的社会存在为背景的新闻与新闻事业》，江苹荑《新闻价值只能来自新闻事实》。

本文参考文献：

[1] Hall, S. (霍尔) (1989), "Ide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Brenda Dervin & Lawrence Grassberg (eds.).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下转73页)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断下降的。90%以上的信息是在"消化不良"的状态下运行的。要提高信息的利用率和质量，就必须对信息加工、提炼、提高、升华来调动储备知识帮助受众消化信息。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节目制作人、节目主持人对信息加工的质量如何取决于他们专业知识的素养。不难想象，一个对中医药知识十分贫乏的节目主持人能对医药的"望、闻、问、切"表达得极具生动和吸引力，以医药家们的"悬壶济世"的品格来感染、影响受众；一个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主持人能将证券交易节目主持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从这个方面讲，电视节目要提高品位，要吸引观众，必须注重节目本身的传播质量，拓宽信息量的深度，而出色的专家型主持人是节目不可或缺的关键所在。

再次，随着第四媒体——网络媒体的兴起，电视广播节目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当时效性的竞争达到极限，表现形式的竞争达到极限，必然规律是向内容、向质量的方面进行转移，人们在充满了港台味十足的娱乐类节目消遣之后，势必希望回到温馨、大方、自然的正常状态，在频率超速、信息膨胀之后，势必希望言简意赅、有客观深度的分析，由单层次的叙述势必转向有预测、有反映、有反馈的多层次结构解剖，这也正是孕育专家型节目主持人大好时机。

总之，随着社会进步，人民生活节奏的加快，尽管节目频道在不断增加，电视节目内容在不断翻新，电视观众的品位在不断提升，受众在不断分流，"一呼百应"、"万人空巷"来形容某一电视节目的盛况已成为辉煌的过去。服务类专题节目在这一日新月异的时代，没有失去什么，相反却拥有无限的机会；作为服务类专题节目主持人，只要抓住机遇，积累经验，提高自身，迎接挑战，才能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有特色的道路，那么就必定会赢得一批固定层面的受众的长期关注。

注释：

① 引自胡智锋《中国电视观念论》第8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专题部《中华医药》 邮编：100859）

[责任编辑：胡智锋]

（接23页）

[2] Hall, S.（霍尔）(1999). "Encoding/Decoding". In Paul Marris & Sue Thornham. "Media Studi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3] 霍尔，(1994)，《"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见唐维敏等译《文化，社会与媒体；批评性观点》。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4] Mcquail, D(麦奎尔)(1994),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Sage Publications.

[5] 张锦华，(1994)，《传播批判理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6] 《党与党报》，《解放日报》1942年9月22日社论。

[7] 王中，(1999)，《新闻学原理大纲》。见陈桂兰《薪继火传》。复旦大学出版社。

[8] 余家宏和丁淦林，(1999)，《王中研究新闻学的经过与贡献》，见陈桂兰《薪继火传》。复旦大学出版社。

[9] 陆定一，(1980)，《我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北京：新华出版社。

[10] 黄旦，(1998)，博士论文《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

[11] 宁树藩，(1997)，《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对话》，《新闻大学》1997年冬季号。复旦大学出版社。

[12] 吕新雨，(1999)，《以人的社会存在为背景的新闻与新闻事业》，见陈桂兰《薪继火传》。复旦大学出版社。

[13] 江莘荑《新闻价值只能来自新闻事实》。见陈桂兰《薪继火传》。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邮编：200437）

[责任编辑：姜依文]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